

台湾儒学传承 与政治认同

陈名实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台湾儒学传承 与政治认同

陈名实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台湾儒学传承与政治认同 / 陈名实著. -- 福州 :
海风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512-0140-7

I . ①台… II . ①陈… III . ①儒学—研究—台湾省
IV .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8748号

台湾儒学传承与政治认同

陈名实 著

责任编辑：万苏杭

出版发行：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350001)

印 刷：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1.75印张

字 数：310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2-0140-7

定 价：42.00元

前　言

新世纪以来，福建社科界兴起对台湾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对闽台区域文化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把历史文化与现实存在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重要性越显突出。本书探讨台湾儒学传承的历史对民众政治认同的作用与影响，从而揭示台湾民众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关系的互动关系，力求对影响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因素进行有益的探索。

台湾民众的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是中华儒学传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相互作用，民族精神始终对本土意识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文化传统维系着对祖国的政治认同。

当前，“台独”势力背叛其祖先的中华民族精神，篡改本土意识的文化内涵，挑动族群矛盾，所鼓吹的本土文化实质上是先住民族文化加上日本的殖民文化，它把台湾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华民族精神故意抹煞，为他们“台独”制造舆论。因此要深入探讨台湾儒学传统下民众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互动的过程与表现形式，揭示台湾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说明中华儒学传统已扎根于台湾的本土文化之中，成为台湾文化的主导思想。

在台湾儒学的传统下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与台湾本土意识长期以来在台湾民众思想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两者相互渗透、转化，对台湾的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源泉。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把传统儒学忠、孝、节、义思想同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结合起来，成为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在治理台湾的过程中，郑成功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力图实现孟子的王道理想。明郑时期，郑经、陈永华推行儒学教育，基本上贯彻郑成功的儒学思想。这

样，反清复明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台湾明郑遗民的本土意识。

清朝统一台湾后，认为程朱理学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消除明郑抗拒与复振的遗民思想，在台湾大力提倡理学中修身养性、三纲五常等思想。因此，清朝在加强台湾儒学教育的基础上，复兴朱子学，培养、选拔儒学人才，使朱子学在台湾得到广泛的传播。部分民众逐步改变反清的思想意识，转而认同清朝。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不断侵略台湾。台湾民众重新强调明郑时期经世致用、抗拒外侮的民族精神，与清朝政府一起共同御敌。中日甲午战后，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群起反对，民众的本土意识表现为强烈的民族精神。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众用各种方式维系着儒学的传承。当日本企图用殖民文化取代儒家文化的时候，台湾民众只好采取保存台湾文化传统的方式抵制日本殖民文化，使得这时期台湾民众的民族精神又融合于本土意识中。

台湾光复后，祖国大陆人口大量迁入台湾。台湾国民党当局大力宣传儒家大一统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提高台湾本土文化中的大中华民族意识，逐步淡化台湾本土文化的地域性，强调对中国的认同。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台独”势力逐步抬头，他们利用长期存在的族群矛盾，把台湾民众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挑动台湾本省籍人与外省籍人的矛盾，鼓吹“本土化”，混淆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的本质区别。其实质是继承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文化传统，把中国文化说成外来文化，以达到争夺政治权力的目的。

因此，揭示儒学是台湾本土文化的主干，其重要内涵就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对批判“台独”分子的“去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 录

概论	1
----	---

第一章 明郑时期台湾儒学的传播与政治特征

第一节 台湾儒学产生的人文基础	20
第二节 台湾的儒学教育	41
第三节 强调“华夷之辨”的汉民族精神	48
第四节 认同明朝产生的台湾本土意识	55

第二章 清朝统一台湾后儒学思想与政治认同的转化

第一节 清除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	61
第二节 教育科举制度的建立与朱子学的复兴	69
第三节 民众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的激荡与隐存	79

第三章 鸦片战争后台湾民众民族精神的重塑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台湾的民族危机	98
------------------	----

第二节 经世实学与道德修养两种儒学传统的融合	100
第三节 认同清朝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	107
第四节 反对日本占据台湾的斗争	110

第四章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民族主义运动

第一节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116
第二节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儒学的本土化与民俗化	123
第三节 辛亥革命与台湾抗日光复思潮	136
第四节 日本殖民统治后期台湾民众民族精神的本土化实践	154

第五章 台湾光复后的本土意识与祖国化措施

第一节 台湾光复后大陆民众移居台湾	179
第二节 台湾光复后民众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的更化	185
第三节 台湾二·二八事件后振奋民族精神的祖国化措施	211

第六章 台湾儒学的现代化

第一节 台湾儒学的发展	225
第二节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下的中国认同	242

第七章 台湾自治愿望与分离倾向

第一节 明朝后期的海商与台湾.....	263
第二节 台湾自治历程.....	274
第三节 政治对抗下的两岸共识与隔阂.....	287

第八章 族群矛盾与“台独”意识

第一节 清代移民的分类械斗.....	301
第二节 群体意识与省籍划分.....	310
第三节 利欲驱使下的“台独”意识.....	318
结语.....	332
主要参考书目.....	333
后记.....	337

概论

自郑成功收复台湾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就成为台湾民众的主导思想，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汉民族意识。然而，台湾由于孤悬海外，在政治上经历了荷兰的占领、明郑政权的反清复明斗争、清朝的大一统治理、列强的武力侵略、日本的殖民统治、抗日战争胜利后光复、国民党政权统治等一系列与祖国大陆有显著不同的历史时期，使台湾民众长期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台湾民众在反压迫、反侵略、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中，产生了热爱台湾家乡的本土意识。由于同时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本土意识，造成台湾民众的文化传统虽然与祖国大陆同胞基本一致，但在各个时期政治上的认同却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一直到当代还未能消除，不仅对两岸共同发展不利，甚至威胁到祖国的统一。因此，探讨台湾的儒学传统，了解台湾民众的文化意识，研究台湾儒学思想的发展演化及对各个时期民众政治认同的影响，对当前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反对分裂倾向具有现实意义。

明朝末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推行殖民文化，宣传基督教。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为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奉南明永历为正朔，在台湾建立政权，把台湾作为南明统治下的领土，进行反清复明斗争。这样，在汉民族精神的主导下，产生以台湾作为基地反抗清朝在大陆统治的本土意识。郑成功逝世后，郑经、陈永华等在台湾兴办儒学教育，在大陆移民及台湾少数民族中传播郑成功所尊崇的以春秋大义、经世致用为主的儒学思想，向民



众宣传反清复明的政治认同。

在明郑时期，台湾民众遵循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来自孔子的思想。春秋时期管仲及齐桓公在中原争霸时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孔子盛赞齐桓公攘除夷狄，挽救了中国，使中国没有沦为夷狄。后世遂以此为华夷之辨。在明郑政权看来，以明朝所代表的华夏文明统一满族夷狄以及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都是符合春秋大义的。只要励精图治，华夏文明必然会赢得民心，实现尊王攘夷的目的。郑成功在北伐南京时，写下著名的七绝《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表达他尊王攘夷的豪情：“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1]

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下，明郑政权特别崇尚忠义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明郑政权凝聚力的源泉，明郑政权周围聚集的文人志士大都具有强烈的忠义精神，崇尚民族气节。在这方面，郑成功的表现具有典范的作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投降清朝，以书招郑成功同降。郑成功以民族大义为重，与贪图富贵的父亲决裂，起兵抗清，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台湾产生深远影响。最能表现这种精神的是宁靖王朱术桂悲情的《绝命诗》：“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2]

为了实现反清复明的目标，明郑政权在台湾招揽人才，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以期把台湾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伺机推翻清朝统治。因此在儒学传统上重视经世实学，体现复振精神。郑成功起兵后，招贤纳士，培养人才。收复台湾后更是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郑经、陈永华继续发展社会经济，并创建台湾儒学。明郑时期的学校教育，改变了明朝末年空谈心性的学风，提倡通经致用。培养有民族大义、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在明郑政权治理下，台湾民众普遍接受儒学中“华夷之辨”的思想，认同明朝为代表的汉族政权。然而，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反清复明的理

[1] 《延平二王遗集》，《台湾文献丛刊》第6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第128页。

[2] 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3页。

想难在近期实现。这样，在明郑政权在同清朝政府的斗争中，又产生分据台湾对抗清朝的本土意识。1667年，郑经在谈判中对清朝表示：“今日东宁，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1]这种希望割据台湾的实质是明朝遗民对抗满族统治的民族精神，在避居台湾后转化成热爱台湾这块不受清朝统治土地的本土意识。这种民族精神与本土意识的并存与互动，构成台湾汉族民众反抗清朝满族统治的两个思想层面。

二

清朝统一台湾后，为巩固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对台湾明郑时期的儒学思想进行全面改造，使台湾儒学教育的内涵发生深刻的变化。清朝宣传的儒学，就是淡化明郑儒学宣传的民族大义，树立大清帝国的忠君明伦思想。

清朝极力否定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儒家思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废除明郑的东宁、承天府、天兴州、万年州，以清除这些名称的反清复明性质。决定正式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3县，隶于福建省。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首任台厦兵备道周昌以《设学校开科考试》为请，呈文福建巡抚金鎔，力陈兴办儒学教育对正人心而善风俗的重要性，“看得风俗之原，由于教化；学校之设，所以明伦。台湾既入版图，若不讲诗书、明礼义，何以正人心而善风俗也？本道自履任后，窃见先进生员犹勤藜火，俊秀子弟亦乐弦诵；士为四民之首，正可藉此以化顽梗之风，而成雍熙之治”。^[2]在这里，周昌强调设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明伦”，就是忠于清朝皇帝，承认满族的统治地位。而“化顽梗之风”，就是消除民众

[1] 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集》，《郑经复董班舍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2]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第一册，卷五，《教育志考选篇》，第27页。



的反清复明思想。

儒学中的程朱理学十分注重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教育与修养，对认同清朝的统治有利，因此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尤其在素有反清复明传统的台湾，官府更加重视。虽然程朱理学与明郑时期台湾儒学思想侧重不同，但实际上朱子学很快在台湾流行。其主要原因是，福建是朱子学的发源地，台湾儒学是从福建传承的，程朱理学中的许多思想已为台湾民众所接受；而且清朝十分重视在台湾的教化，台湾隶属福建，受福建学术思想影响较大，因此朱子学的忠君明伦思想在台湾得到广泛传播。

然而，由于清朝官吏的贪赃枉法，台湾明郑时期的反清复明思想仍在民间流传。受其影响，台湾反清起义频繁，其规模最大的有康熙六十年（1721年）春的朱一贵起义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林爽文起义。朱一贵以明朝后裔号召民众反清复明，称中兴王，建号“永和”。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建元“顺天”，林爽文自号“顺天盟主”。这些说明注重华夷之辨的儒学传统仍普遍存于民间。另一方面，崇尚忠义的思想在清代演化为对忠义神灵的信仰，突出表现为关帝和王爷信仰。台湾的关帝信仰是伴随明郑政权抗清斗争而传入台湾的，这些明朝遗民把关帝神灵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希望关帝神灵的庇佑。而且郑成功的忠义精神与文治武功同关帝神格相似，把郑成功的忠义勇武糅和到关帝的忠义神武中，强调关帝的正统思想，以号召反清复明，在民间影响深远。

清治以后，台湾关帝信仰很盛，凤山知县王瑛曾也明确指出，关帝信仰是遗民忠义精神的体现，他在《重建武庙碑记》中说：“神之志在《春秋》，功在名教。凡忠义志节之乡，尤心向往之。”^[1]但他希望这种忠义思想成为清朝提倡的纲常名教，使台湾百姓改变对满族政权敌视的风俗，能效法关帝的忠义为清朝效忠。台湾另一个普遍信仰是王爷信仰，王爷的等级与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相符。连横认为：“延平郡王入台后，辟土田、兴教养、存明朔、抗满人，精忠大义，震曜古今。及亡，民间建庙以祀。而时已归

[1] 林衡道监修：《明清台湾碑碣选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0年版，第505页。

清，语多避讳，故闪烁其辞，而以王爷称。”^[1]就是说王爷形象与延平郡王相似，人们信仰王爷就隐含着对郑成功忠义精神的思念。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开始对台湾进行侵略活动，中华民族的危机逐步加深。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台湾民众同仇敌忾，坚决抵抗外国武装入侵。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中，台湾民众中汉族反对满族统治的成分淡化，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主流，各民族团结保家卫国，抗击外族入侵成为台湾官民的共识。在此背景下，明郑时期以注重民族大义与经世实学为主要特征的儒学得到复兴，而钦差大臣沈葆桢在推动台湾明郑儒学的复兴中起了关键作用。同治十三年（1872年），沈葆桢到台湾后，看到民间敬仰郑成功，但又不敢公开为郑成功建祠奉祀的情形，认为明郑时期的儒学思想已同清政府没有根本的矛盾，而清政府还可利用这种思想团结民众、抵抗外国侵略。因此，沈葆桢在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向同治皇帝上《请建明延平王祠折》，指出台湾儒者依然信仰郑成功的民族大义，缅怀郑成功开发台湾的丰功伟绩。认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经世致用已成为儒学的最高目标。经过沈葆桢的提议，清廷终于为明延平郡王、开台圣王郑成功立专祠，入国家祀典。其用意是发扬郑成功的反抗外来侵略、收复开发台湾的爱国务实精神，以此激励人们以经世实学开发建设台湾。郑成功精神的重新确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和明郑儒学的复兴，明郑时期与清治时期两种儒学思想在鸦片战争后形成合流之势。

三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把台湾割给日本，这使台湾民众处于亡国奴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明郑时期强调民族气节、反抗侵略压迫的儒学传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台湾民众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自主开展反割台斗争，这场斗争的领导者主要是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儒生。

[1] 连横：《台湾通史·宗教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4页。



在台湾领导人民进行反割台斗争最著名的是丘逢甲，这位进士出身的儒生，在台湾兴办教育，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宣传民族大义，反抗外国侵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就察觉日本侵台野心，散尽家财，组织义兵。《马关条约》签订后，他号召乡绅上书清廷反对割台，率领全省绅民上呈抚署奏请朝廷免除割让台湾。誓死抵抗外侮的民族大义，成为武装抗日斗争的思想基础。

在清廷割台并对台湾民众的抗日请求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台湾民众的儒学思想起了变化。部分儒生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时，对清朝不满，汉族传统的“华夷之辨”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部分儒生仍认同清朝，希望恢复割台前的状况。台湾儒生反满复汉的民族精神，在当时表现为政治上对中国的认同。

虽然有一部分儒生对清朝强烈不满，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抗击日本侵略是当务之急，而且清朝仍是中国政权的代表。因此，儒生们对中国的认同仍然表现为服从清朝，这在成立“台湾民主国”事件中，表现非常充分。台湾民主国的年号为“永清”，表示永远忠于大清。并声明奉清朝为正朔，与中国的大陸领土无异，意即仍然是中国领土。因此，台湾民主国认同清朝，也就是认同中国。台湾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虽然被日本镇压，但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日本占据台湾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歧视和迫害台湾民众，在经济上压榨和奴役台湾民众，而且在文化上用殖民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日本人宣传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废除清代儒学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逐步建立起一套学校教育制度，对台湾民众实行歧视性差别教育，企图把台湾民众培养成忠顺的帝国臣民。传统儒学教育废除以后，台湾儒学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基本条件，民族文化处在被消灭的境地。为抵制日本在台湾强制推行的殖民文化，民众利用书房、诗社等形式，使儒学勉强继续传承。

1903年以后，在日本加强对台湾的统治下，台湾民众的武装反日斗争沉寂下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反清革命思想对台湾民众的影响逐步扩大，政治上从认同清朝逐步向认同中国转化。辛亥革命爆发后，台湾民众

受到鼓舞，一些台湾革命志士参加辛亥革命，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回台湾发动抗日起义。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台湾志士，也积极策划武装起义，谋求光复台湾、回归中华民国。在这一过程中，儒家传统文化对民众的祖国认同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镇压了辛亥革命后的台湾武装反抗后，更加意识到儒家思想对其殖民统治的威胁。1919年至1937年，日本在台湾实行同化政策，大力推行殖民文化，企图消除台湾民众的民族精神。日本殖民政府加强对书房的管理，使儒学传承逐渐失去生存环境。在日本企图消灭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性政策下，台湾人民为保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自发掀起了一场以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为中心的汉学运动。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为民族精神之所附，已经深入人心，它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受到台湾民众的重视。这时期，民众有意识地把儒学融入台湾历史文化中，体现在文学、史学、宗教、民俗、宗族等日常生活中，使儒学逐步本土化与民俗化，实现儒学传承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转换。

1919年以来，正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绝大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受民主、科学思想影响。为了抵制殖民文化，台湾民众在进步知识分子引导下，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文化社团，进行争取民族权利、保存民族文化斗争，把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族精神运用于台湾本土的民族运动实践中。

1937年以后，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以高压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把台湾人改造成日本天皇的顺民。台湾民众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本土社会生活中，对“皇民化运动”进行抵制和抗争。他们把反抗日寇、光复台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抗战上；用各种方法维护民族语言文学；在改姓名时把民族文化融入日式姓名中；尽量保存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通过把民族精神融入本土化的实践，隐蔽地保存中华文化传统，直至台湾光复。

台湾民众发起民族主义运动，抵制日本的同化政策以及后来的皇民化运动，其结果是：一方面，台湾本土意识大大加强，民众对台湾本土化产生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把台湾与日本本土区别开来，对抗日本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台湾的抗日运动与祖国的民族振兴及抗日战争相联系，中国大陆



的社会变革对台湾产生巨大影响，台湾民众寄希望于祖国打败日本，光复台湾。而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虽然失败，但也在台湾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一些人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对中国的认同，在精神和情感上都倾向于日本人，形成日本意识，并且把日本意识说成是台湾本土意识。还有一些人对祖国的认同发生了疑惑。台湾作家李昂小说《迷园》中的主人公就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迷惘；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描写了台湾民众沦为半个世纪历史孤儿的困惑。因此，必须认识这时期台湾的本土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条件下的转化，是反对日本殖民文化的产物。

四

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人民看到台湾光复的希望，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的认同。日本投降后，台湾民众奔走相告回归祖国的喜讯，满腔热情做迎接回归的准备，儒学传统铸就的民族精神日益高涨。

台湾民众为了迎接台湾光复，争相学习国语。民众抛弃日本国旗，赶制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国旗，购置烟花爆竹，急切盼待着重回祖国怀抱这一天。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民俗活动迅速恢复，人们纷纷砸烂日式神龛和神像，把祖先的牌位重新供奉起来，焚香祭祖，告慰祖先。人们纷纷改变日式的衣食住行习惯，恢复传统汉族的民间习俗，迎接回归。

1945年10月25日上午9时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台湾同胞欣喜若狂。下午3点，台北各界民众召开庆祝光复大会，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庆祝台湾重返祖国”。台湾作家吴浊流曾写道：“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复那天就吹走了。”^[1]这说明日本殖民文化并不能消灭台湾民众的中华文化传统，不能改变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

然而，台湾毕竟被日本侵占50年，海峡两岸交流的缺失造成理解上的错位。国民政府接收大员对台湾的实际状况不够了解，忽视台湾民众的政治

[1] 台湾：五十年回归路（四）复疆（探索·发现2005-146）。央视国际2005年08月4日。

诉求和经济利益。加上国民党政治独裁、吏治腐败，很快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积弱积贫的现实也缺乏认识，在光复后对前景过分乐观。在1946年台湾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台湾民众感觉现实与理想差距越来越远，于是在1947年爆发了“二·二八”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这场涉及面很广的群众运动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武力镇压，致使台湾光复后高涨的民族精神迅速沉寂下来。而长期以来孕育于民众心中的本土意识，受到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势力的鼓动而急速膨胀。许多人主张台湾自治，一些人争取国外势力的支持，利用台湾的特殊地位，提出“联合国托管”等企图分裂祖国的主张。针对这种背离祖国认同的政治倾向，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从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对台湾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祖国化措施，包括：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吸收台湾有识之士担任台湾省政府重要职务，省政府下属各机关吸收一批有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士到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对参加二·二八事件的绝大部分人宽大处理；废除经济统制的特殊政策，发展民营经济，藏富于民；宣传儒家思想，加强民族主义教育等。而对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少数人，坚决反对和压制。

通过台湾省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努力，振奋民族精神的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台湾民众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创伤逐渐平复，民众的政治思想又朝着认同祖国的方向发展。然而，少数顽固不化的“台独”分子仍然在利用二·二八事件煽动“台独”，国民党政府又不愿彻底解决二·二八事件的遗留问题，公布事件真相，承认错误。因此，尽管台湾省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但事倍功半，且留下隐患。

五

1949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随之而来的大陆民众有百万人，台湾社会上自然形成讲闽南方言或客家方言的台湾本省人和有其他方言口音的外省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形成台湾海峡两岸不同政权对峙的局面。蒋介石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希望